

菲利普·罗斯: 在自传和自撰之间^{*}

陈红梅

内容提要 国内学界对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常冠以“新现实主义”作家的称号,而对其“新现实主义”的表象缺乏细致的考察。本文选取其后现代主义手法之一的技巧——利用自己真实的个人信息和生活素材来建构其小说世界为基础,以作家的传记《事实》和“菲利普·罗斯”为叙述者的《夏洛克行动》为例,追溯了作家这种创作手法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认为在罗斯的后期创作中,他因此形成的“人物扮演”有效地表现了其所关注的问题,成为他后期优秀作品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菲利普·罗斯 真实 虚构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5.02.010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 1933—)是美国当代一位深孚众望的作家,获得过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是一位受读者青睐也受评论家瞩目的重要作家。国内对罗斯的译介和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学术研究在过去十年不断深入,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身份认同、犹太文化、社会伦理和美国梦等主题,研究对象则仅涉及作家31部作品中《再见,哥伦布》、《人性的污秽》、《反生活》、《美国牧歌》和《凡人》等作品。国外研究成果众多,包括文化身份、自传和自我书写、高等教育、后现代性与民族表述等,视野宽广,也有一些评论探讨罗斯的写作特点。^①自《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以来,罗斯在许多作品中运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写作自我。出入于其九部作品的内森·朱克曼(Nathan Zuckerman)与作家的年龄、民

族、家庭出身、职业、生活轨迹和志趣都相仿,成为菲利普·罗斯创作的招牌人物。出版两部自传《事实》(*The Facts*, 1988)和《遗产》(*Patrimony*, 1991)之后,罗斯甚至在虚构作品中用自己的名字给主人公命名,写作了所谓的“罗斯系列”,包括小说《欺骗》(*Deception*, 1990)、《夏洛克行动》(*Operation Shylock*, 1993)和《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2004),共五部作品。已有评论关注到这些作品侧重身份和自我操演性的后现代写作,^②但对罗斯运用自身信息写作的手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将在对照《事实》和《夏洛克行动》中写实和虚构的基础上,结合作家早期作品的接受状况,探讨其手法的流变及意义。

^{*}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课题“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他者书写研究”(编号:2014SJB040)的研究成果。

一、真实中的虚构与虚构中的真实

无论自传还是他传，读者爱读名人传记；无论亲自操刀还是他人代劳，名人爱写传记。菲利普·罗斯也不能免俗。经历30年创作生涯后，罗斯于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自传《事实》。在以父亲中年的一次手术和正在老去的事实昭示生命源头为开场之后，罗斯常规地回顾了自己从童年、大学、第一次婚姻到1969年出版《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成为成功作家的历程。与一般自传一样，罗斯也回顾了自己年轻时的孟浪和成长，但这部自传的不一般表现在其开头和结尾的两封信。开头的信是传主罗斯写给他多部小说的主人公内森·朱克曼，向他解释写作自传的初衷（在于自我治疗，以期从遭受的错误医疗以及由此带来的心理问题中康复）、自己对自传写作的看法和写作中的顾忌，还请他直言该传记是否应该发表。因此，结尾那封信顺理成章是朱克曼写给罗斯的回信。在这封长达35页的信中，朱克曼直言批评罗斯的传记，提请他不要出版，因为罗斯“‘准确地’汇报自己的生活不如写我【朱克曼】写得好”。^③他对罗斯这部只有短短150页的自传的主要内容一一发表了看法。首先是内容失真，没有如实汇报自己的经历。尽管记述了一些成长事实，但忽略了内心动机和感受。其次，在感情处理上有失偏颇。父母之爱太过简略，夫妻之情有失公允，情人之恋过于避讳。朱克曼充分运用了作家赋予他的批评权利之后，甚至让妻子玛丽亚（Maria）发表看法，后者列出了对这部自传的八点评论，总体上肯定了他的写作，并认为完全可以发表，与朱克曼的观点大相径庭。从篇幅上看，这部不足两百页的自传简单涉及朱克曼的虚构部分与传主的事实部分比例达1:7之多。

时隔四年，罗斯在《夏洛克行动》中又玩起了他“改变生活和作品界限的试验”，^④将

故事设置在《事实》出版和以色列审判德穆亚纽克（Demjanuk Trial）的1988年，大量运用其个人生活经历来写作小说。与《事实》里两封信的做派类似，罗斯在《夏洛克行动》的《前言》中煞有其事地声明，“出于法律原因，我不得不在本书中改变……不太重要的事实，所有改动……在第一次出现时均用小圆圈标出。本书源自本人的记事本（notebook journal），是我1988年初亲身经历事件的精确记载”，^⑤并简略介绍了德穆亚纽克一案档案来源的大背景以力证其真实性。与之呼应的是，《尾声》之后，作家又在《致读者》中指出：“本书纯属虚构，除第三、四章引用的发表于1988年3月11日《纽约时报》与阿佩费尔德的对话和第九章援引同年1月27日上午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德穆亚纽克庭审记录外，所有名字、人物、地点和事件均出自作者想象或虚构，任何……雷同全为巧合，本坦白乃系杜撰。”（《夏洛克》，399页）一方面极力述真，另一方面全力证伪。内容上，小说叙述的起点正是《事实》中提到的促使作家写作自传的膝盖手术，并进行了比前一部自传更为细致详尽的描写。“菲利普·罗斯”（尽管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与作家的相同，但是根据叙述学，此乃叙述者和人物，而非作家本人，因此，为论述方便，下文将加引号来指称作品中的菲利普·罗斯以示区别，或简称为“罗斯”）还未从引发写作《事实》的精神崩溃中完全康复，身在纽约的他听说有人打着自己的名号，利用自己的声望在以色列推行一项政治运动——“流散主义”（diasporism），即号召艾什肯那兹（Ashkenazi）犹太人离开以色列，回到祖先在欧洲的家园以免遭到阿拉伯人可能进行的第二次“大屠杀”。正准备到以色列去采访该国著名作家阿哈龙·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 1932—）的“罗斯”发现自己面对比小说还离奇的现实。到达以色列后，在与冒充自己的假“罗斯”莫伊瑟·皮皮克（Moishe

Pipik, 意第绪语, 意为“摩西的肚脐眼”, 罗斯幽默地以历史上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摩西来喻指他将带领犹太人离开以色列, 割断其联系) 面对面的争斗中, “罗斯”被绑架, 甚至还被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派到雅典去执行绝密行动。行动结束之后, “罗斯”要把这一行动写入自己的小说中, 跟他联系的特工斯迈尔斯伯格劝他不要这样做。《夏洛克行动》就是除他所执行的绝密任务“夏洛克行动”^⑥之外, “菲利普·罗斯”在以色列经历的“真实”记录。

在《夏洛克行动》中, 罗斯在塑造两个“罗斯”时大量运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以及作品的诸多细节。两个“罗斯”长相一模一样, 骗过了侄儿阿普特, 也骗过了好友阿佩费尔德, 乃至后者打电话到纽约去验证其究竟身在何处。假“罗斯”的年纪、职业、家庭和种族出身等均与作家罗斯一样, 而且作家的生病、早期作品的接受以及为创作进行的中东日程等真实事件, 私人朋友索罗塔洛夫及其儿子和阿佩费尔德等真实人物的出场, 都赋予小说强烈的传记色彩。小说中, 假“罗斯”对真“罗斯”说, “我对你的书了如指掌, 我对你的生活了如指掌, 我可以写你的传记, 我就是你传记的作者”。(《夏洛克》, 73页) 学者鲁德尼斯基结合罗斯两部自传中的相关事实, 通过比照克莱恩斯密特1967年发表在著名心理学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 研究罗斯年轻时做精神分析的论文《愤怒的行为: 攻击在创造性中的角色》, 探讨了罗斯小时候被母亲关在门外以及与第一任妻子的关系对塑造假“罗斯”的情人波泽斯基的影响, 认为对皮皮克儿时创伤的描绘是基于罗斯自己的经历, 为此可确信《夏洛克行动》是罗斯的真实告白(confessions)。^⑦ 尽管《夏洛克行动》具有如此重大的事实性基础, 但是它的虚构性质不可否认, 评论家们也莫不将其归为小说, 而非传记。^⑧ 可见, 罗斯在写作真实的自传中

请虚构人物出场大力杜撰, 而在写作虚构的小说时又大量利用自己的真实生活激发想象,^⑨ 真实和虚构水乳交融, 孰真孰假难以分辨。

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流变

“所有的小说都部分地是自传, 任何自传都部分地是小说——伟大小说家的作品更是如此。”^⑩ 话虽如此, 但绝大多数作家在其虚构作品中都千方百计抹掉自己的生活痕迹, 菲利普·罗斯却反其道行之, 大张旗鼓地谈论、运用自己的生活经历, 可以说热衷于在创作中自我指涉和自我想象。罗斯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既有作家个体因素, 也是时代解放作家的结果。20世纪生命写作(life writing, 包括自传和他传) 和研究成为显学, 经过解构思潮的洗礼, 传统自传的真实性遭到彻底质疑。“从时间与自传记忆的关系来看, 自传文本的真实性必然是一种自传叙述人用满足当下自我意识的方式来‘认同’自我的构建性, 即茨威格指出的自传是一种‘制作’而不是复述。”^⑪ 自传是传主对自我“真实”事件重构和解读的结果, 其真实性是选择性真实, 说到底, 是文本真实。因而, 其自我也仅为文本自我。同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后现代写作风起云涌, 调侃、戏拟、反讽等技巧同样侵入自传写作, 消解传统自传的“宏大叙事”, 其结果便是后现代自传“同传统自传相去甚远, 同现代或后现代小说则很难区分”。^⑫ 上世纪70年代以来, 许多法国成功小说家加入到后现代自传创作的队伍中, 80、90年代, 东风西渐, 美国先后出版了沃尔夫(Tobias Wolff)、迪拉德(Annie Dillard)、普赖斯(Reynolds Price)、邓恩(John Gregory Dunne)和福特(Richard Ford)等众多作家的自传。这些作家的自传和他们的小说没有质的差别, “他们自己也几乎没有人承认其自传与其他创作的区别, 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区别已经模糊到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自传小说(autobiografiction)的

文学形式”。^⑬罗斯创作具有审美意义的自传应该说是当时文学氛围中很自然的结果。

虽然后现代写作给了罗斯大胆创新自传形式的机会，但是罗斯在虚构写作时利用自我进行想象在更大程度上源于其早期作品的读者接受对他的影响。罗斯的第一部小说集《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 1959）得到了阿尔弗雷德·卡津、欧文·豪和贝娄等名家的广泛好评，并获得1960年美国全国图书奖。然而，罗斯在采访中回忆道“自从《再见，哥伦布》出版以来，[我]就一直受到一些拉比和刊物的攻击，被认为是危险的、不诚实和不负责任的。”^⑭罗斯所称的批评主要来自犹太群体内部，针对其质疑犹太信仰的《犹太人的改宗》（*The Conversion of the Jews*）和《信仰维护者》（*The Defender of the Faith*）以及揭露犹太人生活不光彩方面的《爱泼斯坦》（*Epstein*）这几部作品。犹太民众对希特勒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心有余悸，害怕暴露自身缺点将陷于不利之地，罗斯因而被指责为“反犹太”和“自我憎恨”。个别德高望重但恼羞成怒的拉比甚至在公开场合宣称要采取行动让其禁声（《阅读》，133页），而有的读者则“把他拽出英语系”（《阅读》，134页），纽约耶希瓦大学甚至组成了有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参加的专家小组召他去问讯（《事实》，125-29页）。对此，1974年罗斯在接受欧茨（Joyce Carol Oates）采访时谈到当时的感受“这些不公正的指责都是‘反犹’这样不可忽略的大帽子，我的血往上涌，怒气升腾，感情受到伤害，耐心受到考验……”（《阅读》，134页）对于这样干扰到实际生活的读者反应，罗斯既解释自己的观念也维护自己的立场。事情过去近30年后，罗斯遭受的严重读者反应事件仍然是他接受采访时绕不过去的话题。^⑮另一方面，对这些作品的写实手法，以豪为代表的评论家虽然肯定他的成就，但也认为他不加改造地运用生活素材，缺少回味的余地。^⑯

这些艺术上的批评对罗斯的影响不如对创作主题的批评那么大，但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罗斯来说，这些评价无疑引起过他的深思。罗斯曾这样写到自己的创作经历“在我写作一开始来的这场风波以奇怪的方式给了我方向和重点，要不，情况可能不一样”（《阅读》，134页）

这场激烈的读者反应对罗斯的影响是及时而深远的。罗斯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为自己辩解，更重要的是他在写作上做出调整，在内容和叙述方式上都有新探索。他在随后出版的《放手》（*Letting Go*, 1962）和《当她顺利的时候》（*When She Was Good*, 1967）转向美国西部中产阶层的生活，作品里没有一个犹太人物，语言上也极为干净，不带任何肮脏的字眼和场景。然而，这样的转型并不成功，当时就有评论认为《放手》的语言、人物形象和结构设计都有欠缺，《当她顺利的时候》仍被认为是自己生活的写实。^⑰罗斯也觉得这并不是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认为这两部作品“跟最压抑的文学巨著一般压抑”，郁闷压抑了好几年的罗斯感觉应该发挥自己才华的另一面，“摆脱禁忌写点好玩的东西”。（《阅读》，22页）罗斯天性幽默，特别是爱好犹太喜剧。先前指责他暴露犹太人生活过时和有失颜面的批评给了罗斯启发，经过七八年两部作品摸索后，他终于下定决心“嗯，你们想要，我就给你们，波特诺伊喷出来了！”（《阅读》，134页）《波特诺伊的怨诉》采用心理分析“自白”叙述，主人公波特诺伊对父母、性、饮食习惯等犹太传统的僭越对当时的读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运用作家自身经历和生活细节的现实主义手法赋予了作品强烈的自传色彩，也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争议作家的窥私心理，一时间读者先睹为快，带给了作者更大的恶名和同样大的成功，罗斯成了文学名人和媒体宠儿。

新作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罗斯，早期的读者接受风波以更持久的方式对他的创作产生影

响,他不时在作品中直接或隐晦提及和嘲弄曾经发难的读者或评论家,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生活素材,消费自己写作生涯中的文学事件。1984年罗斯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波特诺伊家里极度压抑的道德氛围很大程度得归功于犹太群体内部官方对我处女作执拗的意见。”(《阅读》,156页)在《我们这一帮》(Our Gang, 1971)、《乳房》(The Breast, 1972)和《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1973)中试验了不同体裁后,罗斯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写作之道,1974年出版的《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是一部主人公与作者相似的元小说。接着,在1979年出版《鬼作家》之后的八年时间里,罗斯写作了朱克曼三部曲,不时从自己先后经历的文学事件中寻找灵感,内森·朱克曼也成为罗斯的标志人物。在被认为是隐晦回应读者风波的《解剖学课》(The Anatomy Lesson, 1983)中,朱克曼吃了过量的去痛药,喝高了,摔倒在一个犹太墓地的墓碑上,磕碎了下颌骨,对此,罗斯不无得意地说,“我这是给那[纽约]拉比的”。(《阅读》,133页)另外,尽管罗斯不承认,但是批评家们认为当中被嘲讽的犹太评论家阿佩尔(Milton Appel)身上有撰文批评他的欧文·豪的影子。同时,与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中一样,罗斯将其作品的背景不断设置在其生长的纽瓦克,构筑起现实版“约克纳帕塔法县”,布拉德利海滩、威夸伊克犹太高中和总统街等实际地名总给读者写实解读的暗示。因此可以说,罗斯早期创作生涯中遭受的读者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的写作,反映出有过受压迫和被歧视历史的少数族裔作家,身份也是影响其创作和作品接受的重要因素。罗斯研究专家、《罗斯研究》(Philip Roth Studies)主编和罗斯研究会(Philip Roth Society)创始者罗亚尔(Derek Parker Royal)曾经评价说,“如果没有《波特诺伊的怨诉》的名气和反响,可能永远也不

会有一个执迷于生产自我的内森·朱克曼或一个叫‘菲利普·罗斯’的文学人物”,^⑧而其名气和反响则部分地源于《再见,哥伦布》引发的批评。

无论读者是否进行自传性解读,罗斯确实在其作品中运用各种手段营造“自传性阅读”的氛围,混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综观罗斯作品,他一方面调遣与自己相似的人物展开想象,波特诺伊、后来著名的朱克曼以及“菲利普(·罗斯)”等都是其写作自我的代表性人物。另一方面,他又大量运用自己的生活素材,营造自传性阅读指向。《我作为男人的一生》、《我嫁了一个共产党人》(I Married a Communist, 1998)、《欺骗》与朱克曼系列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这种创作倾向。罗斯甚至在命名作品时也不放过诱使读者作自传遐想的机会。《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反生活》(The Counterlife, 1986)、《事实——一部小说家的自传》、《欺骗——一部小说》和《夏洛克行动——自白录》等作品中,罗斯从标题到叙述者都运用自我指涉意味强烈的第一人称,给人以作品乃作家自传的心理期待。而且,罗斯还在不同的访谈中提到作品里写作的“生活”经历,造成文本内外的呼应,似乎在将其创作和生活营造成一个巨大的“元文本”。他在多次访谈中都提到《我作为男人的一生》、《夏洛克行动》和《事实》等写到的,他在一次膝盖手术之后用药不当造成精神崩溃以及对创作的影响。在罗斯创造的这个由作品、访谈和生活组成的本文中,代言人(如朱克曼等名字不同,但人物信息与作家相似的人物)和同名人(名字相同,生活细节与作家相似的人物)穿行出没在自《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以来的大部分作品中,直至最终在《夏洛克行动》中“亲自登场”,达到利用自我进行想象的最高峰,而后者入围普利策文学奖并为作家捧得注重文学性的福克纳笔会小说奖则是对作家这类创作最好的认可。

三、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张力

罗斯上世纪7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作品强烈地表现出后现代艺术特征，^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运用包括自撰在内的手法有很大关系。吃过写实手法苦头的罗斯深知赋予作品艺术张力的重要性。在写作《波特诺伊的怨诉》时，他就发现“越写作事实或自己的生活，故事就越缺乏共鸣和启示”。（《阅读》，37页）对于这一困难，罗斯进行了仔细思考和不断实践。从口技艺人的技法得到灵感，罗斯认为其奥妙在于他发出的声音既是他的又不是他的。对借用口技手法进行创作，他曾总结道“作为一个作家，你在扮演人物（impersonation）的时候不必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信息。你不放弃的时候可能更有趣。你把它扭曲变形，对它夸张讽刺，进行滑稽模仿，你折磨它、颠覆它、利用它——这都给那些信息一个使你的言语生活激动的维度。”（《阅读》，144页）罗斯这里所说的“人物扮演”与杜波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所说的“自撰”是一致的，都是作家利用自己的生活展开想象，进行艺术创作。因此，作家生活经历的再现形式和表达内容之间的关系赋予作品艺术张力，这成为决定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罗斯在《鬼作家》的第三部分《冤孽美人》中首次使用这个技巧，让青年朱克曼想象楼上的爱美就是大屠杀中遇害的犹太少女弗兰克（Anne Frank），使之成为自己与父亲以及社区和解的桥梁，并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使用。就《事实》和《夏洛克行动》这两部作品而言，罗斯首先从标题设置到结构编排上都有意反向利用自传和小说解读契约调动读者。对自传，作家突出其小说家编故事的虚构性，而对小说，罗斯又采用与署名相同的叙述者，铺张地写作自己的生活经历，给读者以纪实故事的假象。结构上，罗斯用往来信件、前言、后记以及“致读者”等形式时而强调真实、时而宣称虚构，以这些部分相互矛盾的反讽表现主题的复

杂性。内容上，对遭受了前述读者激烈反应委屈的罗斯来说，“自传还部分地存在于那些观点之间的冲突、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张力以及理解的自传冲动和虚构本能间的矛盾”。^②将其自传命名为《事实》，罗斯表达了毫不妥协地面对生活真相的决心。罗斯用了整整一章《都是家务事》叙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读者风波，展示了当初承受的各种形式的压力，也揭示了这一经历给予自己创作灵感的过程。罗斯在给朱克曼的信中写道“这本书稿体现了我的另一种生活（counterlife），是集中体现在想象的你身上所有假想的解药和答案”（《事实》，6页）

生命写作时代，罗斯没有像卢梭那样全部自己交待自己的生活，而是让他我（alter ego）朱克曼出场为他“还原”作家不便写作的“另一种生活”。钱锺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曾让人物代言“自传就是他传”，自我存在于与他人的关系中，真实地写自己不可避免地要描写别人。反过来，“他传也是自传”，^③别人关于传主言行的叙述，虽不能全都当真，但细察之下也能获得重要讯息。在朱克曼的点评中，他既无情地揭露罗斯的个人生活，也解释他的创作探索，深入到传主罗斯心里，为他的“造物主”辩解，答复公众的质疑，与罗斯侧重叙述外部行动的主体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至此，确如朱克曼在信中所言，虽然罗斯有充分的自由，他自己仅依附于罗斯，但是“我是你袒露心迹的钥匙”（《事实》，162页）“没有我为你出面，你不知道，更无法谈论置身何处”（《事实》，165页）。虽然朱克曼批评罗斯为保护亲朋改变了他们的名字导致自传失真，是他认为不值得发表的原因，但这一叙述不可靠在伦理上能获得读者谅解。然而，因保护亲朋而避免提及的内容由朱克曼道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自传单一叙述者的不足，开拓了叙述空间，从另一个视角补充传主的生活。典型事例是罗斯第一次婚姻破裂后结交的女友梅（May）。这位罗斯最困难时期的女友占据了《事实》相当大的篇

幅,因其仍健在,罗斯为了保护她而改其名,但是,用朱克曼的话说,使用“是我[罗斯]所认识的长相最可爱的女子……脾气好、随和”(《事实》,131-35页)之类空洞宽泛之辞没有表达应有的情意,因此“我[朱克曼]很怀疑她的出身阶层、背景和品位远非令人印象深刻,肯定是让你厌恶……她还可能是个瘾君子……你不想再要一个堕落女子”。(《事实》,181-182页)朱克曼虽然婉转,但是有必要深思的是,传主罗斯正是通过虚构人物之口隐晦道出了他作为成功作家羞于启齿的与风尘吸毒女子厮混的不堪生活。在回复给罗斯的信中,朱克曼对其传记或批评否定,或讥讽揶揄,但无不为了传达“事实”。由此可见,后现代传记中,尽管写作手法让人眼花缭乱,但作家们还得面对该文类对传记事实的基本要求以满足读者对真实性的正当期待,对读者而言,阅读后现代自传则需要更多的脑力激荡和参与。

与《事实》不同的是,《夏洛克行动》利用真实自我进行想象,书写了多重“罗斯”和自我。作品特别惹人瞩目的是封面上署名的作家菲利普·罗斯、小说叙述者“菲利普·罗斯”和皮皮克假冒的“菲利普·罗斯”,三个罗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分享了作家罗斯的生活。作家罗斯是作品的写作者,给读者提供了真实的参照和潜在的解读语境,小说中真假“罗斯”的塑造都建立在作家罗斯的传记和心理细节基础上,建构了作品隐含作者不同的自我,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叙述者真“罗斯”是著名作家,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的代表,假“罗斯”作为“流散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和“反犹无名会”(Anti-Semites Anonymous)的创建者,既有反对以色列犹太人的理论也有反对犹太人的行动,可以看作作家年轻时被指责的反犹思想的“投射”,是作家罗斯的“对立自我”(antithetical self)。^②假“罗斯”皮皮克是真“罗斯”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在生活细节、行为举止、穿着打扮上都模

仿他并大胆渗透到其亲友圈内,给后者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身份焦虑。双方第一次见面,真“罗斯”就向皮皮克扬言,要诉诸法律,维护其权利,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是他的私有财产,不得为他人所盗用”(《夏洛克》,75页)。尽管“罗斯”并未对皮皮克采取法律行动,但谁有权力讲述“菲利普·罗斯”的故事贯穿了两个人的冲突与争夺,阿佩费尔德一语点中真假“罗斯”争斗的要害“太好了……你要重写他。”(《夏洛克》,107页)真“罗斯”迫切需要维护书写自己的权利,但是远离美国、身在异乡的他并没有战胜假“罗斯”的信心,转而操起了皮皮克的话语,要以皮皮克的话语胜出皮皮克。真假“罗斯”之间既有身份的争斗,也有思想上的较量。真“罗斯”作为美国犹太人既不赞成对阿拉伯人的战争和反人道行为,也不支持对以色列的过激行动,“假”罗斯则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极力推行自己的“流散主义”主张,反对以色列的极右立场。由于真假“罗斯”难分彼此,真“罗斯”被当作亲阿拉伯分子、反犹太的假“罗斯”绑架,困在一间教室里,上演了最令人眩目的一幕,读者稍不留神也将犯同样的错误。面对皮皮克“你浪费了你的特权,许多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夏洛克》,78页)、“我就是赤裸裸的你,预言家的你,勇于献身的你”(《夏洛克》,87页)等有力的声声质疑,真“罗斯”看到了自己欠缺的不切实际的一面,前者所具有的正是自己所缺少的,因此,冒名者皮皮克被理解为代表了像罗斯那样置身以色列之外却关注以色列问题的犹太知识分子不具备的一重身份。^③看到以阿冲突带来的巨大痛苦又深入了解假“罗斯”的思想之后,真“罗斯”转而接受“流散主义”思想,甚至接受摩萨德的召唤到希腊去执行任务——“夏洛克行动”。无论是真是假,有了现实中操刀捉笔的罗斯作参照,真“罗斯”从与假“罗斯”争夺身份和对以阿关系无动于衷到接受皮皮克的“流散主义”,进

而参与其中体会到以色列现实问题的复杂和微妙，这是作家罗斯对当今以阿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重探索，^②作品中的人物以作家的真名实姓出场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与许多后现代作家，如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库弗（Robert Coover）和德里罗（Don DeLillo）等在作品中运用福特、弗洛伊德、尼克松等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历史真实不同，罗斯用自己一个普通人的名字探讨虚构的真实，这种方式赋予作家微妙的创作空间，也给读者独特的阅读感受。

然而，《夏洛克行动》并不是简单地书写真实，除小说组成部分间的不确定性之外，整个叙述不断地质疑。一开始听到有人假冒自己，真“罗斯”强调自己的合法性，对假冒事件的叙述充满了质疑其可靠性的议论。真假“罗斯”交锋的过程中惊疑莫测，而在《后记：说话只会坏事》中，真“罗斯”出版“夏洛克行动”真相的意图又被否定，删除第十一章“夏洛克行动”的原因在于摩萨德认为“光以英语出版就会严重损害其所在机构以及以色列政府的利益，更不用说以其他15种语言来出版了”（《夏洛克》，357页）。具有完全创作自由和信心的作家先把手稿交给摩萨德特工斯迈尔斯伯格审查，一是因为自己反常地不自信，二是为了“如实讲述整个行动”（《夏洛克》，359页），也为了确认“这不是有意识的做梦”，真“罗斯”被自己讲述的故事弄糊涂了，担心自己将再次陷入精神混乱，乃至需要寻求帮助，而斯迈尔斯伯格则认为“不将其以小说的形式出版将是最大的谎言”（《夏洛克》，391页）。这种从故事开始到结束贯穿始终的肯定与否定、真实与虚构的张力令读者喘不过气来，“几乎随时将小说撕裂开来”，^③罗斯理想中“导向启发的张力”（《事实》，167页）实现了它的艺术魅力。难怪肖斯塔克说，从朱克曼系列起，“罗斯对生活素材的运用不再是简单的创作来源或自我疗伤的手段，而是上升为塑造其后来创作的认识论和美学上的中心问题”。^④

在《夏洛克行动》结尾，“菲利普·罗斯”告诉读者他早期对艺术的信念之一是“没什么需要隐藏在小说中”，但是当他开车到纽约去与曾为之听命的摩萨德特工会面时，“罗斯”问自己“对于无可隐藏的，是否有限制了呢？”（《夏洛克》，377页）这个问题回荡在罗斯大部分创作生涯中，但无论是从自传还是小说都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没有”，却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了限制。

注释：

- ① John N. McDaniel,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Roth’s Artistic Vision”, in John N. McDaniel, *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 (Haddonfield NJ: Haddonfield House, 1974), pp. 199 – 216;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Philip Roth*, ed. Harold Bloom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3), pp. 107 – 118; Sanford Pinsker, “The Comedy that ‘Hoits’: ‘The Breast’”, in Sanford Pinsker, *The Comedy that ‘Hoits’*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5).
- ② 有关罗斯系列后现代写作手法的研究主要有罗斯研究专家艾伦·库柏和伊莱恩·B. 塞弗探讨具体作品中罗斯这种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对主题阐释的意义，彼得·鲁德尼斯基则将罗斯的自传《事实》和小说《夏洛克行动》联系起来解读作家在后者的写实手法，详见 Elaine B. Safer, “The Double, Comic Irony, and Postmodernism in Philip Roth’s *Operation Shylock*”, in *Melus*, Vol. 21, Issue 4, 1996, 157 – 172 页。另参见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Philip Roth*, 101 – 117 页; Allen Cooper, “It Can Happen Here, or All in the Family Values: Surviving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in *Philip Roth: New Perspectives on An American Author*, ed. Derek Parker Royal (Westport CT: Greenwood-Praeger, 2005), 241 – 253 页; Peter L. Rudnytsky, “True Confessions in *Operation Shylock*”, in *Philip Roth Studies*, No. 3, 2007, 26 – 43 页。
- ③ Philip Roth, *The Fac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8), p. 161. (下文中所有来自小说文本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只在括号中标明书名《事实》和页码。)
- ④ Harold Bloom, “Operation Roth”,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April, 1993, p. 45.
- ⑤ Philip Roth, *Operation Shyloc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p. 13. (下文中所有来自小说文本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只在括号中标明书名的略称《夏洛克》和

页码。)

- ⑥ 罗斯模仿以色列政府多次接运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亚非国家和地区犹太人返回迦南地的“摩西行动”(Operation Moses)、“所罗门行动”(Operation Solomon)和“出埃及行动”(Operation Exodus)以及美国实施的“约书亚行动”(Operation Joshua),杜撰了“夏洛克行动”来指称“罗斯”到雅典暗杀叛变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反复国主义分子的报复行动。
- ⑦ Peter L. Rudnitsky, “True Confessions in *Operation Shylock*”, in *Philip Roth Studies*, No. 3, 2007, pp. 28–35.
- ⑧ See Harold Bloom, “Operation Roth”,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April, 1993, pp. 45–48; Robert Alter, “The Spritzer”, in *New Republic*, 5 April, 1993, pp. 31–34; Esther B. Fein, “Philip Roth Sees Double. And Maybe Triple, Too”, in *New York Times*, 9 March, 1993, C13.
- ⑨ 自撰 (autofiction) 是小说家、批评家杜波罗夫斯基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概括自己在《费尔斯》(*Fils*)中主人公与作家同名、利用自己生活进行虚构的写作手法以挑战勒热纳在《自传契约》中“作者与人物同名乃自传”这一有失僵化的分类。本文取其“利用真实生活经历进行虚构”之义,题目中的“自传”仍属已被广为接受的勒氏的定义,即“真实的个人以生活经历为素材用散文文体创作的侧重个性的回顾性叙述”。
- ⑩ Ruth Bernard Yeazell, “Henry James”, in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Emory Ell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668.
- ⑪ 王成军 《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3 年版,75 页。
- ⑫ 杨正润 《自传死亡了吗?——关于英美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载《当代外国文学》2001 年第 4 期,125 页。
- ⑬ Peter J. Bailey, “‘Why not tell the truth?: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ree Fiction Writers’”, in *Critique*, Vol. XXXII, No. 4 (Summer) 1991, p. 211.
- ⑭ Philip Roth, “Interview with *The Paris Review*”, with Hermione Lee, in Philip Roth,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4), p. 149. (下文中所有来自该文集中的访谈引文均出自此版本,只在括号中标明书名的略称《阅读》和页码。)
- ⑮ 罗斯在多次访谈中被问及遭受的读者过激反应和作品引发的争议,详情可参见收入在 Philip Roth,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及其他收集在《费利浦·罗斯谈话录》(George J. Searles ed.,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Jackson Mo: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中的访谈。
- ⑯ 详见 Irving Howe, “Philip Roth Reconsidered”, in *Commentary*, December, 1972, 69–77 页; Irving Howe, “The Suburbs of Babylon”, in *The New Republic*, 140. 24 (15 June 1959), 17–18 页。据豪,阿尔弗雷德·卡津也持类似观点。
- ⑰ Stanley Edgar Hyman, “A Novelist of Great Promise”, in *The New Leader*, June 11, 1962, pp. 22–23; reprinted in *Critical Essays on Philip Roth*, pp. 37–38.
- ⑱ Derek Parker Royal, “Texts, Lives, and Bellybuttons: Philip Roth’s *Shylock Operation* and the Renegotiation of Subjectivity”, in *Turning Up the Flame: Philip Roth’s Later Novels*, ed. Jay L. Halio and Ben Siegel (Newark NJ: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p. 70.
- ⑲ 黄铁城曾撰文研究罗斯创作生涯的手法流变,详见《不断翻转的万花筒——菲利普·罗斯创作手法流变初探》,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 年第 1 期,56–63 页。
- ⑳ Philip Roth, “‘The Facts’ as He Remembers Them”, with Mervyn Rothstein, in *The New York Times*, 6 September, 1988, sec. , C17; reprint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pp. 226–27.
- ㉑ 唐岫敏 《论自传中自我叙事的主体身份》,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9 年第 1 期,38 页。
- ㉒ Elaine M. Kauvar, “This Doubly Reflected Communication in Philip Roth’s Autobiograph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XXXVI, No. 3, 1995, p. 437.
- ㉓ Elaine B. Safer, “The Double, Comic Irony, and Postmodernism in Philip Roth’s *Operation Shylock*”, in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Philip Roth*, pp. 102–03, reprinted from *Melus*, Vol. 21, No. 4, 1996, pp. 157–172.
- ㉔ 罗小云 《〈夏洛克行动〉中内心探索的外化策略》,载《当代外国文学》2009 年第 3 期,96–100 页。
- ㉕ Philip Brauner, *Philip Roth*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4.
- ㉖ Debra Shoska, *Philip Roth: Countertexts, Counterlive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p. 168.

(作者单位: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段映虹

constructed unique 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racial political thoughts through his music aesthetics. His multi-racial cultural democracy thoughts are expressed through an elabor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zz and Blues: a “one country , one nationality” perspective , an individuality and independence style as well as a culture hybridity and dialogue method. Namely , no matter what races they are , Americans are the American people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play the harmonious tone collectively only if different races maintain their individuality and independence; racial groups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should realize cultural democracy through culture hybridity and dialogue.

Russian Ballet and Woolf’s Novel Writing

JIANG Ho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aghilev’s Ballet Russes (popular in Paris and London in the 1910s and 1920s) on Virginia Woolf and her novel writing. It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elements of Russian Ballet and dance motifs in her novels. It points out that they stimulate and inspire Woolf to pursue in earnest the new form of expression of the novel , which helps develop her two idiosyncratic concepts of “envelope” and “changes of rhythm” , the former emphasizing its freedom , abundance and variety of things in the world , and the latter stressing the internal rhythm peculiar to the existence and changes of things. A tension therefore is formed between them , which has come to form the basis for Woolf’s new novelistic form.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se two concepts mark a new development of her literary ideas and a perfect unity of concept and practice in her novel writing.

Philip Roth: Between Life-writing and Life-imagining

CHEN Hongmei

American writer Philip Roth has often been labeled as neo-realist in China , but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manifestations of his neo-realism. Based on his autobiography *The Facts* and his novel *Shylock Operation* with Philip Roth as the narrator , this essay traces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his way of writing his fictional work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biographical details and events in life , and holds that his skill of “impersonation” thus formed effectively expresses his concern in the works and explains in part the excellence of his consecutive works in the later years of his career.

Violence in Gaze: Reading Paul Auster’s *The New York Trilogy*

LI Jinyun

Paul Auster sets up three structures of gaze in *The New York Trilogy*. By telling stories , he shows how the protagonists create their ideal ego and destroy themselves under the gaze of the ideal ego , exhibits the actual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violence in gaze , and reveals the subjects’ inevitable tragedies.

Variations on Subject and Other: Tournier’s *Friday* as a Revision of the Myth of *Robinson Crusoe*

REN Haiyan

Daniel Defoe’s *Robinson Crusoe* gave birth to a modern myth of the Enlightenment. Michel Tournier challenges the values as embodied in this myth through his deconstructive revision *Friday*. Arguing from